

『走走党史』系列

长征

悲壮的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的黎平会议

报捷的五岭三关

大渡桥横铁索寒

惨烈的湘江之战

进军松潘毛儿盖

茫茫草地生死行

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标志的遵义会议

报捷的五岭三关

毛泽东论长征和新一代领导长征精神

悲壮的战略转移

夺取天险腊子口

中央红军下天山的最后征程

中央红军万水千山的最后征程

南下红军的艰辛转战

张国焘分裂党的阿坝会议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和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

毛泽东吟长征诗

从卓克基到黑水芦花

哈达铺确定长征落脚点

石仲泉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长征行

石仲泉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征行/石仲泉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

ISBN 7-80199-341-1

I. 长… II. 石… III. 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史料

IV. 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0289 号

书 名: 长 征 行

作 者:石仲泉

责任编辑:陈海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异 16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28.75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341-1/K·272

定 价:39.8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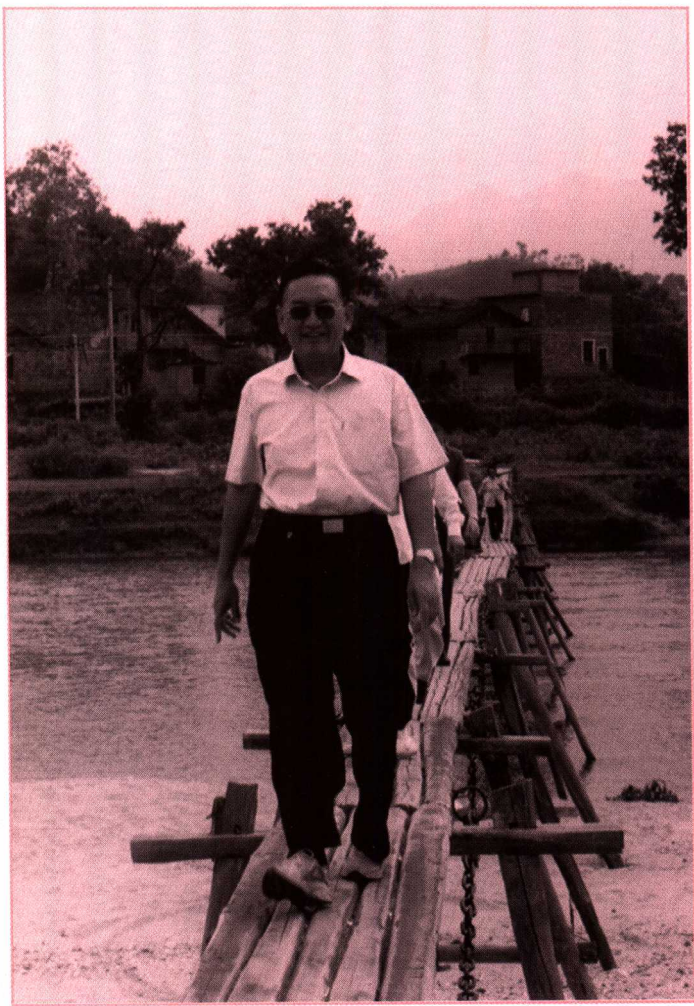
电话:82517249,82517244

作者简介

石仲泉，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1938年5月出生，湖北红安——荆州人。195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64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8年调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职称为研究员，兼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在室任职期间，主管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等业务，兼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个人主要专著有：《我观毛泽东》、《周恩来的卓越奉献》、《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和《“三个代表”思想：领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论》等。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等。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毛泽东研究述评》、《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八大史》、《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中国共产党新世纪宣言——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思想》等。有多本著作和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图书奖和优秀论文奖。

1997年9月至2005年6月，断断续续地基本走完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和其他方面红军的部分长征路。



作者走在红军长征出发的桥上

暖犬夜
楊橫鐵
寒更盡
岷山雪
雲之末
區外及
長閑
蒼

丙午
三月
詩

長征詩三首

紅軍不怕

遠征難

萬水千山

只等閒

五嶺逶迤

騰細浪

當驚起

走泥丸

金沙水

拍天聲

前言

我过去几本书的前言都是“一言到底”，不分节的。这次想作点“改革”，跟正文一样，也分节设小题目，便于读者阅读，把握每一部分的中心。此前言，姑且作为一个尝试。如果效果不好，下本书再改过来。

为什么要“走走党史”

1995年初，我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调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负责编修党史工作期间，就听到不少议论，自己也有直接感受：正规的党史出版物太概念化。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首任主任胡乔木同志曾讲过这个问题，并对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本子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讲的内容很多，在我看来，这么四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多用一些新的事实。对于这种事实，一定要有新的见解，对于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的认识。二是要有生动的场景描写。把历史过程写得比较生动，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三是要有名人逸事。党史要写好人物，如写陈独秀，使人感到是一个活生生的陈独秀。四是要有提神之笔。过程要有波澜起伏，不能写成死水一潭；议论要有新的思想，不能总是陈言老调。

乔木同志的这些要求讲得很好，但是要在我们写的本子里体现这几点很不容易。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一点与我们党史工作者缺乏对党史的实际体验有密切关系。因此，这些年逐渐形成一个观点，或者说萌生了这样的理念，即党史工作者有一个由概念党史经过



体验党史,形成形象党史,再来叙述和理论党史的问题。党史工作者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应尽量走出“书斋”,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走与不走,大不一样。这既可以丰富党史的内涵,也有助于党史研究走向深入,包括校正一些史实。一般地说,经历了一番体验而写的党史、军史、革命史,不会是文山会海,而是有具体材料、生动情节的;不会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不会是干巴的,而是鲜活的,让人喜闻乐见的。这就是我要“走走党史”的缘故。

上面讲的“这些年”,主要是跨入新的千年世纪的2000年以来。这是从做党史专题考察所引发的。此前,虽然不时参加地方的一些活动,到各地走走看看,但没有去做党史专题考察的特别安排。因为到党史研究室工作后具体负责主持编写中共党史中卷的工作太紧张。1998年,中共党史中卷由撰稿、统稿到第一轮定稿基本完成。1999年以后,开始对“中卷本”进行第二轮修改,这就是开始启动的“第二卷”;而这时我的主要工作已逐渐转为负责编修中共党史第一卷。有过去中共党史上卷的基础,相对地说,这段时间没有前一段写中卷那么紧张。

促使我要展开党史专题考察的一个重要动因,是2001年11月上



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发言

旬到江西瑞金参加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红



都”的瑞金,我一直没去过,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早就神往之。再则,具体负责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工作,对作为土地革命战争主要发生地的中央苏区这段极其复杂的历史,有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是很清楚,想趁此机会作点调研,增加些党史的实感,推动个人对一些问题作较深入的研究。因此,在踏上这块红土地的那个瞬间,就油然而萌生了要亲吻它和探究它的感情。参加理论研讨会后,对赣南的部分地区就党史上的一些问题作了实地考察,使我感到收获不菲。由此更强化了要作党史专题考察的理念。

2003年初,受室委会委托,前往我室对口扶贫的四川省叙永县,慰问困难群众。随后,在川南、黔北、黔西北就红军长征经过当地的历史情况进行调研。走了“四渡赤水”的各个渡口,先后到四川最南端和贵州西北角的赤水两岸的悬崖峭壁考察了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区,对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又了解了一些。于是在思想上开始形成一个观念:党史工作者有一个由概念党史走向体验党史的问题。是年1月13日,在贵州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的座谈会上,我讲了这个看法。当时是这样讲的:

——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党史工作者应尽量走出“书斋”,努力去感受和体验一下所研究的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作研究,有感受和体验,与没有感受和体验,是很不一样的。我不是提倡经验主义,只是强调研究和写作党史,仅仅知道一些党史概念,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些党史情况是不够的。凡有条件 and 可能,要尽量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特别是像我这样不是党史科班出身的,更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即如何从概念党史,进入到体验党史。近两年作了些党史考察后,渐渐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我自己言,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和五次反“围剿”斗争,过去总感到太复杂,不容易理清楚。2001年和2002年作了两次赣南考察,将中央苏区发生过重要党史事件的一些地方作了调研,有的



情况就比较清楚些。在编修党史一卷本时将一些重要材料丰富进去了,对个别原来不准确的史实也作了修改。这次考察“四渡赤水”,对我教育很大。“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经典之作。其行程几乎占整个长征行程的十分之一,是整个长征取得胜利的最具关键性的一个阶段。这次对“四渡赤水”的路线进行了比较多的调研,就不再只是抽象的地名概念,而有了具体形象。一谈到“四渡赤水”,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赤水河沿途的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和那几个渡口的生动情景。毛主席那首《长征》诗中的“乌蒙磅礴走泥丸”,不就是描写红军“四渡赤水”,来回穿插于川南、黔北和黔西北,以及滇东北这一带的情景?!只看注文解释,对它理解不深。经过考察后就有了较为实际的感受。毛主席的诗确实气势恢宏。从而,对这首诗所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了更深的领悟。这就是由概念党史进入到形象党史。而要能有党史形象,就需要体验党史。所以,这次跑一趟,尽管苦一点,累一些,但还能吃得消,特别是对党史的体验更深了,感受更强烈了,可谓受益匪浅。

从四川叙永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回京后,我就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如释重负。长期以来,我自认是学林中人,让我双肩挑,很吃力,卸下一副担子,没有了行政事务,专心治学,乃梦寐以求之。我超龄过点几年了,现在不下,更待何时?如今,这一愿望实现了。一年前(2002年),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关于龚育之同志两本书的座谈会上,我谈到老龚同志时,曾引述了裴多斐的“自由”诗,并对自由的内涵作了锁定,强调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有更多的写作时间,追求学术真理的自由度更大。那时,我很羡慕老龚。不到一年,我也加入这个行列,不是“心想事成”么!

也正因为有了这个自由,我才能得以去“走走党史”。

为什么要用“走走党史”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可能有点不伦不类,文理不通,或粗俗不雅,也听到过一些同志劝我改题的建议。但也



有一些同志认为,这个题目,比较通俗、形象、直白和大众化,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也能听得懂。按照目前比较时尚的说法,它能体现“三贴近”,即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这里的“走走”是转意的,即走走看看之意。要说明的是,题目的全称本是“走走党史之路”,后来感到“之路”二字似有点累赘,将其省略了。于是就发生了“走走”这个实化的具体动词与“党史”这个虚化的抽象名词是否搭配的语法修辞问题。我想,这种省略语在生活中不少。因此,《百年潮》连载时一直这么用着。约定俗成吧,能意会它,不发生误解即可。当然,我也要琢磨一下这个题目,欢迎读者提出好的建议。在没有满意的题目之前,暂且这么先用着——《走走党史(之路)》。

“走走党史”,最初只想写成几组文章。这两年走的多了,可能会辑成系列集子。目前先从走走长征开始。

为什么要从走长征路开始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崇尚英雄、讴歌革命的环境中成长的。到了目前这个岁数,这个信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很难改的(我以为,这与时俱进、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等并不矛盾,它们是在不同层面上,针对不同的问题而言的)。我还在中学时代,就对老师讲的长征故事听得十分入神。在北大作研究生时,看北京军区文工团演出的《长征组歌》,就对红军长征异常神往。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党史部门工作,将来会走长征路。历史就是这样由必然与偶然的交错发展而形成。我既然在研究党史,而且有了要“走走党史”的想法,这就有了怎么走的选择问题。如果说青年时代,对长征的向往是感性的,那么研究党史以后,对长征的理性认识,就对我“走走党史”从何走起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学过党史的都知道,红军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是八十年波澜壮阔历史最惊心动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红军长征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的空前的严酷考验。这个考验是多方面的,如在长期危难中有没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有没有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在缺吃少穿、长途跋涉、体能消耗极大的情况下有没有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还有在敌军不断布下重兵前堵后追的情况下有没有摆脱绝境、转危为安的战略战术?等等。长征的结果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经过长征,党如同经受一次炼狱。吃了那么大的苦,耐了那么大的劳,饱尝了那么大的磨难,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还有什么邪恶反动力量能吓倒?还有什么缺点错误不能改正?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到今天,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从中可以得到答案。这段历史不仅不能忘,而且要大书特书。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可谓是中国共产党之魂。因此,走走党史,首先要走长征路。

我走长征路的基本走法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走长征路。这些年,走的人越来越多。据我所知,影响比较大的,如新闻记者罗开富同志,在1984—1985年间就走了长征路。他是完完全全按照当年红军的路线(包括行走日期和每天所到地点)徒步“克隆”走的,那时《经济日报》每天都发他的采访报道。这300多篇报道于2001年汇集成《红军长征追踪》上下册出版了。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走过长征路和采访过许多老红军特别是不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后,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国作家魏巍同志在考察后,写了《长征——地球上的红飘带》。据说,还有陈靖将军也走了长征路,但很遗憾我没有拜读到他的书。此外,还有我的同行——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的邹嘉南同志,在2003年3月我在遵义开会时,知道他参与拍摄电视剧也在走长

征路,他写的《西行笔记》一书于2004年10月出版了。

许多人走长征路的具体行走情况,我不了解。2004年10月在江西于都参加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听了罗开富讲他走长征路的情况——白天徒步行军,再难走的路,有车也不坐;累了、病了,晚上甚至半夜困乏之极还坚持写采访报道,一篇不落下。这种精神使我十分感动。我在走长征路的过程中,还听说有两个英国青年也在走长征路^①。后来知道他们的中国名叫李爱德和马普安。他们从2002年10月到2003年7月,用了近10个月的时间,也是徒步走长征路。这种精神追求很值得我们国内的年轻人学习,也值得我学习。我还听说有的农民、个体户或退休者也在走长征路。2004年7月,我就碰到了作为红军后代的两姐弟



在江西长征路上思考

在沿着他们父亲的足迹走长征路。我对所有走了的或准备走的,以及有各种原因走不了但很向往的人,都表示我的敬意。

既然有这么些人走了长征路,那么有不少同志就问,你走长征路有什么特点呢?我对一些同志讲过我考察长征路的情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走法。不同的经历会有不同的体验,观察会有不同的视角,考察自然有不同的内容。

我走长征路,跟上述所讲的有些不同。这主要是根据我的情况和要求来决定的。这个不同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

——我是分段走的,不是专门用很长时间从长征的出发地一直

^① 2004年冬,从《北京晚报》上看到他们的连载,据说他们写的《两个人的长征》已由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不停地走到长征的终点站。2003年初以前我在领导岗位时,如果是到长征经过的省区开会和调研的话,那么就结合工作之便,到那些地方作长征考察。在岗位上,外出的时间有限,那时考察长征的地方很有限。2003年初我退下来后,外出时间充裕些,走的地方也就多一些。这一年上半年结合开会,走了属于贵州、云南的长征路。下半年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用了一个半月专赴四川、甘肃、陕西走过去没有走过的长征路。这样,从1997年9月开始到2003年10月,总算断断续续地基本走完了中央红军长征路的全程,同时还有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段。2004年7月、11月和12月,结合外出活动,又顺便补走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过去没走过的小段长征路。2005年6月,又补走了红军东征到达晋西的几个县。

——我主要是以车代步,没有采取单纯徒步走路的方式。公务在身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徒步走。目前没有多少公务了,也不可能像当年红军那样去徒步走。一是毕竟年纪更大了,早已过花甲,体力、精力不允许。二是更为重要的,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要走那个路,主要是了解考察长征路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影响的重要地方,召开过重要会议的旧址或遗址,走访在当地的当事人、亲历者和知情者



考察长征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驻地瑞金云石山乡马道口村

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该徒步走路的就徒步走路;不需要徒步(如单纯赶路),或不能徒步(无法行走)的,就以车代步。

——我是以中央红军走



的长征路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因考察时间毕竟有限,不可能将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路统统走一遍,安排时以走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为主,尽量兼顾其他两个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走湖南、贵州、云南的长征路时,兼顾了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在走四川、甘肃和陕西时,既兼顾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也兼顾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

——我是与地方党史工作者一起考察。我到一些省、区时,相关地方的各级党史工作者都参加走了属于他们那个地段的长征路。这样,或三五人,或七八人不等,一边考察,一边研讨问题,有助于弄清一些历史细节,矫正一些史实错误。

长征路,我断断续续地走了五六年,走的比较集中的、大片的,是退出领导岗位后的这三年。

走长征路的几点收获

现在走长征路,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没当作“游山玩水”去作逍遥游。我们的每次行程仍然安排得比较紧,因为陪同走的同志都有很多工作,不可能长时间在外,还是要抢时间、赶路程,同时还要尽量多看一些地方、多访问一些人。这样,不少考察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特别是2003年秋天在川、甘、陕一个半月多的考察,这是长征路走的最长的一段时间,真有点风尘仆仆,走下来满是劳累和疲惫。好在实现了最初愿望,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也就乐在其中了。

谈到走长征路的收获,各人的情况不一样,收获会各不相同。我是从研究党史的角度来走长征路的,而且主要走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相比之下,对红二方面军特别是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走得少。因此,本书讲长征也主要以个人对中央红军长征历史的考察作基础,兼及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一些情况来谈一些看法。这样讲长征认识,自然不那么完全,会遗漏某些,甚至可能



有偏颇之见,请谅解。这里,初步地讲这样几点收获。

第一,亲身经历了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当年中央的错误的思想和军事指挥,使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并遭受重大损失。红军离开苏区时与老百姓那种难舍难分的故事说不完、道不尽,催人泪下。湘江战役打得十分惨烈的情景,这在书中有专章叙述。我在考察湘江战役之前,真没有想到:在争夺湘江渡口时,会倒下那么多的红军,殷红的鲜血竟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下。其战斗之残酷,牺牲之惨烈,是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特别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冲破桂军包围,急行军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在回征湘南后全军覆灭。师长陈树湘负重伤被俘,在亲手绞断腹部伤口的肠子而牺牲后,丧心病狂的敌人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先后吊在道县和长沙城门口示众。听到这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红军将士在长征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事迹很多,很感人。其所见所闻,我这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第二,进一步感受到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对红军和党的命运的巨大作用。经过湘江战役,红军广大指战员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这以后,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包括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会议,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这些会议对于形成、发展和巩固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都起了重要作用。过去比较多的是孤零零地研究这些会议的作用。通过考察,明确感到这是个系列会议,形成一段历史链条,每个会议是其中的一个历史环节。这众多环节的合力作用推动形成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是形成这段历史伟大转折的根本标志。这样,就更能正确把握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会议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始,尽管他不负总责,但实际上已确立了他在党中央的实际的核心领导地位。他参与指挥军事,随后直接行使指挥权。毛泽东指挥作战,完全是以我为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走我的,不为任何其他因素动摇决心。比如说,书中讲的苟坝会议。这是长征途中在遵义附近召开的一次会议。当时,除毛泽东外,都主张进攻打鼓新场,即现在的